

我国城市化面临“二元结构”新挑战



城市化吸引着人们进入城市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在几年之内城市化率就将过半。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旧有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城乡之间由于户籍等因素形成的藩篱长久存在,新的二元结构正在凸显——大量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并未融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还没有充分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如何破除这双重的二元结构,考验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两亿“准城市人口”融入难题

有许多人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享受到市民应有的均等的公共服务。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将这个群体称为“准城市人口”,他估计人数在两亿以上。他说,以常住人口计算,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而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8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籍。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城市,但并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此外,还有多达4000万的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现状尤其令学者们感到忧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中国的就业人口中,农民工占主导。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后一般就业于低技能、低收入的行业,同时没有组织,谈判能力又极低,所以工资水平低

下。这导致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很低。

比经济收入更糟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农民进城谋生,但又不可能获得所在城市的户口,他们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前几年法国出现移民区骚乱后,有识之士就提醒说,中国的“二代移民”同样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难题。当他们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又在城市中形成了较高的心理需求,不满足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报酬极低的体力劳动,另外也没有掌握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回到乡土社会,这种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

在法国2005年移民不满引发的骚乱中,有5000多辆车被烧毁,其他国家也不乏类似事情。欧盟“城市行动”项目主任彼得·拉姆斯登认为,这应该归咎于长期以来欧洲在移民政策方面的投资不足,移民没有好的养老金,没有好的医疗,住房也过于拥挤。“社会融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说。

他建议中国在就业、住宅、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咨询与服务,确保移民能感到自己有权利享受这些服务。

“农村人口进了城,尤其要保证他们拥有与城市人口均等的发展机会和教育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马金斯基说,这一点,只能依靠政府来完成。

以市场化方式突破户籍瓶颈

长久以来,户口清晰地划分着城与乡的边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城镇户口代表的权利有五项,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而农村户口的权利有三项,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把农村户口的三个权利转换成城市的五个权利,改革非常复杂,争议性也很大。”崔之元说。

尽管目前少数地区由于农村物质条件大幅提高,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现象,但城镇户口的福利含金量在绝大多数地区居高不下。

而越是在城镇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越难推进。

2010年8月以来,重庆开展迄今为规模最大的户籍改革。计划在第一阶段即今明两年内,将33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为了鼓励转户农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重庆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一是农民在转户后有3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享受各项土地收益。二是过渡期结束后的退出也不是剥夺性的,而是有偿退出。

在此之前,重庆还设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农民通过土交所退宅基地,每亩可以拿到十多万元人民币,并且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居住。“我觉得,重庆模式是令人兴奋的政策,值得大家关注。”崔之元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全国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但探索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即采取市场化方式来突破户籍制度的瓶颈。

他建议,在某些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借鉴国外的跨国移民的方式,向已经进城的、有工作的农民工或者外地工人先给一个“绿卡”,有长期居住权并享受本地居民待遇,这个绿卡可以发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根据绿卡的量来决定自己的劳动用工量。每个持卡者在一定的时间,比如五年内,如果合理工作、遵纪守法,可以转为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李稻葵还建议,建立“可移动式”的社会保

障。如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给有户口的居民一个可携带的、量化的、货币化的福利待遇,引导他们逐步搬到周边的地区生活,为使具有竞争力的新人口进入这个城市腾出空间。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托·尼赫鲁也赞同这种“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一些福利与服务可以随劳动者迁移而移动”的尝试。他说:“一个人选择就业地区时,不应取决于他在当地能否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而是应该取决于这里是否具备为劳动者提升经济发展机会的要素。”

尼赫鲁认为,选择前述尝试,还能让一个城市的竞争力转向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而不是单靠政策强化。

促进要素在城乡双向流动

能否使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缩小到与户籍无关?一些人士认为,这需要加强对小城镇的建设,促使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埃里克·马金斯基说,目前中国是从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单向流动”,不能解决问题。从长远看,全球范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一个不平衡的人口流动结构,无法寻求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他认为,农村人口扎堆去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机会落后于城市。提供中小城镇和中心镇基本与大城市相等的就业和发展机

会,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步。

德国前副总理约施卡·菲舍尔说,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把已有的绿色技术转移到乡村和小城镇里,对乡村的建设非常有帮助。在加强小城镇建设问题上,政府肯定要要进行大的投资,然后再由企业来完成追加投资。最近几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做了许多类似的工作,政府投入很大,中国可从中得到一些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初步观察到,在上海、浙江、江苏等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出现了转折即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此前的农村人口、资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转变成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也正是中央所概括的“城乡统筹发展”。李扬认为,当前政府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来促进城乡统筹更快地展开。

他说,促使这一转折包含五个因素。其一是城市地区完成工业化,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就业困难,资本和劳动力无法集中;其二,经济发展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城市优势减弱,甚至和乡村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三,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接近尾声;第四,逃离城市水泥森林,追求绿色环境的生活方式渐成时尚,并形成社会潮流;第五,由于上述原因,在整个资金的配置上,乡村的资金收益率高于城市。如一些投资家正投资在上海崇明投资养老、健康产业。

据新华社



进城的人们正努力融入城市 (资料图片)



进城的农民工在看相关规定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news.com

谁该为小汽车的“过度使用”买单

在16日北京交通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交通高层论坛上,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称,交通拥堵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一个有规律性的问题,北京并不是“世界首堵”。有调查显示,在北京低于5公里的出行中,小汽车占到40%,这说明北京的小汽车存在过度使用的问题。(10月17日《新京报》)

从专家的言论中,我们不难解读出两点信息:一是驳斥把北京列为“世界首堵”城市的观点。这可以看做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8月24日发布的“堵城榜”的回应,该榜把北京列为5个入选城市之首,成为世界首堵;二是“小汽车过度使用”,被指为导致北京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之一。

笔者以为,急于辩白和较真北京拥堵状况在世界“堵城榜”的排名位次大可不必,以此为动力,从根本上重视和解决现实存在并且有可能长期存在的交通拥堵“城市病”,构建城市绿色出行环境,更有意义。因此,人们的关注点应当放在如何化解“小汽车过度使用”的问题上。

小汽车缘何会被“过度”使用,这个“度”怎样把握?有专家主张通过经济,甚至法律手段来解决小汽车的发展问题,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但同时以为,解决“小汽车过度使用”问题,还必须从汽车使用的理念、出行效率的考量、社会资源和环境的优化等方面,引导市民树立绿色出行意识,用堵疏结合的方法发挥好各类交通工具的作用。

“小汽车过度使用”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发展能够承载的汽车拥有量的“饱和度”,二是优化市民舒适出行的汽车“使用度”。曾几何时,人们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视为一个城市繁荣发达的象征,而如今随着小汽车无度发展造成的“车多为患”,又让人们不得不采取限行、封存部分公车、错时上下班等限行措施。根据北京市交管局通报,截至9月6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50万大关,达到450.3万辆。更让人忧虑的是,按照目前的机动车增长速度,预计明年上半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将突破500万辆大关。对此人们不得不反思,小汽车到底是提高出行效率的代步工具,还是追赶时尚、彰显富有的身份象征。凡事皆有度,当我们面对严重的车流拥堵而亦步趋地挪动,呼吸着刺鼻的汽车尾气,压抑着内心的焦虑,何谈舒适和幸福。

面对拥堵的烦恼,人们自然会想到公交、自行车和徒步出行,然而,公交的拥挤,自行车道的被占,又不得不让人“逼”回车上。前段时间北京市对自行车出租面临尴尬的议论就是佐证。因此,解决小汽车过度使用,除了通过提高汽车使用成本,采取经济手段限制其无度发展外,更要从构建城市绿色交通网,充分发挥各类交通工具的综合运力,特别是疏通自行车交通线,整顿自行车出行秩序,创造条件提高5公里以内的自行车出行比例,构筑近距靠骑行、中心靠公交、外围汽车跑的交通结构。玉成

贤者之贤与有钱就是贤

贤者之贤的反面是见利忘义。在有的人眼里,现在有钱就是贤。人们不向贤人学,就会“见钱思齐”,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所谓“成功学”。什么是成功?有钱就是成功,为名利不择手段而成功,亦为大家所羡慕所效仿。见贤思齐浅显之意是说好的榜样能对自己产生震撼,道德的内动力驱使自己努力去赶上。现在震撼人们的是逾越规则、不顾道德、不顾伦理的成功,成功意味着一切,甚至于能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见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作用力,要学会自省,不要脚踏西瓜皮,溜哪儿算哪儿。但是,内省既需要定力,亦需要能力,在社会坏的事物熏染之下,精神世界本身即匮乏之人,哪里会有这样的自省精神?

孔子要大家见贤思齐,是要大家在个人的内心建立道德感、价值观,并不断地向那些比自己贤的贤者学习。只要人们还没有丧失敬畏之心,就不会将对自身有益的贤者之贤

完全抛到爪哇国里。这个世界不可能绝了贤人,就像人们不可能没了所要呼吸的空气。最近,本土人看到,即便远在智利,那里也有贤人。智利矿难营救结束后,曾给总统送上矿石作礼物的获救矿工塞普尔维达接受传媒专访,忆述被困最初之日。他声称,所有人在矿井内靠民主机制做决策,并且分工合作,经常互相鼓励,才能成功坚持到最后。被困矿工在井下生活数月所表现出的团结、友爱和强烈的生存意志,及地面上那些救助矿工的人们所表现的忘我精神,不都是本土儒家修身养德式的贤者之贤吗?对比一下本土多数矿难的结局,不正需要人们见贤而思齐吗?

有众多贤者的地方,才是好地方,才是有安全感的地方,才是适宜人们生存的地方。丛林法则盛行和文明努力逆转为无奈的社会,不是好社会,那是危邦。而居于危邦的人们,在弱肉强食世界喘息的人们,既是不幸的人们,还是可怜的人们。今语

忙碌的市民怎解“休闲城市”的风情

“2010第二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评选揭晓,杭州、成都、南京等城市获得了“休闲城市”的名片。(10月17日《华西都市报》)

一座城市到底是否足够休闲,关键还在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真实感受,而不在于几个专家评委的坐而论道。没有谁会容忍自己处于“被休闲”的状态,人们之所以会对休闲城市产生关注,说到底,就是因为当下城市人对对自己的权利生态已经保持一种自醒。

尽管休闲城市评选有其独特的标准体系,但尊重每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很多时候恐怕比那些空洞的标准理论更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把南京、杭州这些城市排在休闲城市的前列,在网上也激起很多嘲讽的声音。众所周知,在这个房价高企的年代,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更是以高房价闻名四海。高房价迫使很多城市白领移居西部二三线城市,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被高房价捆绑的,其实就有很多权利,其中也包括休闲。

买不起房,入不了户,安不起家,很容易把人带进教育、医疗等多种权利与福利的困境。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房价状态会极大降低人的生活品质,休闲自然也就是极其奢侈的事。或许,生活在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很多人尽管买不起主城区的房子,但还能勉强买得起偏远郊区的房子。这样就势必要在交通上支付大量的时间。而休闲意味着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利用。在那种语境下,人们又到底还有多少“可自由支配时间”呢?恐怕更多的人还会选择放弃节假日的休闲时光,来为摆脱房奴的生活不停地“奋斗”吧。

在今天,劳动机会、劳动权利和其他劳动资源的分配,还存在着种种不公平现象。对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谁都不敢不珍惜手中那个难得的饭碗。特别是面对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高消费,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载着沉重生活与生存压力。于是,在人们的背后,似乎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强迫着我们加班加点,快节奏地进行工作。生命如陀螺不停旋转,很难有停歇之期。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充斥着无数的劳动者因为工作太累发出的沉重喘息声,一些企业还存在着过度加班而导致大量的职业伤害,甚至“过劳死”现象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神经。

自由不仅与休闲相关,它首先还与权利有关。从这个意义讲,如果不能先真正有效地盘点一下今天公民的居住权、休息权、健康权等权利,而去用“休闲城市”来营造一种休闲的虚妄与空幻,这实在有些很不厚道。这一点,相信生活在“休闲城市”里“被休闲”的人们最能感同身受。最令人心的是,这种“休闲城市”的名片,会不会是少数城市管理者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用纳税人的钱买来的呢? 红丽

新闻漫画：“钱”途



海春绘

新闻漫画：望吃却步



吴金武绘

增加居民收入需可行路线图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讨论未来5年的政策蓝图。为期4天的会议将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专家透露,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但是,与这一骄人的数字并行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在陷阱里,财富分配的分化同样高速发展。经济增长是涉及所有人的事,但并没有被所有人深刻感知。一边是全球的多数奢侈品正在抢滩,正在被少数中国高收入者吸

纳和消费,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人口未能脱贫而处于被救济状态。这幅怪异景象充分表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有限。即使占据多数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高强度的经济和生存压力面前也疲惫不堪。

收入分配的失衡,不但拉大了人们的心理落差,也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生成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还拉大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落差。与财富资源的不均衡常常捆绑在一起的是教育、就业等基本民生资源的不均衡,由此导致贫富呈现出代际传递的态势。

在GDP保持8%~10%的增长幅度的情况下,让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意味着居民

收入保持大致增长幅度。如果实施顺利,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限定在3%~4%的前提下,已经连续超过7个月的“负利率”给居民带来的实际财富损失,将得到有效的对冲。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好处这么多,关键还在落实。除了刚性的法律规定加以保障外,还有一系列课题需要解决。比如,劳资双方明显不对等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谁来监督?非工资收入部分的投资渠道能否拓宽,以多样化的理财方式应对资金只能聚集于楼市和股市的无奈?社保能否实现全国流转?这些问题既涉及及公众的利益保障,也涉及公众权利的扩大。现在需要绘出可行的路线图。 立凡